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一个阶层的消失

晚清以降塾师研究

蒋纯焦 著



3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G629. 299/1

2007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一个阶层的消失

晚清以降塾师研究

蒋纯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 / 蒋纯焦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8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80678 - 745 - 8

I. 一... II. 蒋... III. 私塾—教师—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G62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691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一个阶层的消失

——晚清以降塾师研究

蒋纯焦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50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745 - 8/G · 64
定 价 38.00 元

序

唐宋以后，私塾逐渐发展起来。明清时期，私塾发展达到鼎盛，各类塾馆散布城镇乡村。由于中国古代隋唐以后的历朝政府，实行的都是以考试——入仕为导向的精英教育政策，只办理为数有限的中央官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这些官办学校大多课以经业，并不以识字读书为务，而中国传统广大民众初步的文化知识教育，就都由这些民间兴办的、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特点的私塾所承担，无论是文人士宦，还是贫寒子弟，几乎都是在私塾中得到他们最初的启蒙教育。私塾事实上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基础教育的主体，在传统教育体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不了解私塾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教育。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基础教育机构，任一私塾的任一教育教学活动均由私塾教师主其事。塾师是私塾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知识的传承，年青一代读写算技能的形成，乃至生活经验的获得，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劳工作。由此又可以说，传统中国的基础教育是由遍布城镇乡村无数默默无名的私塾教师支撑起来的，不了解塾师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教育。

因此，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开始受到挑战，教育也开始脱离传统的轨道，逐渐向现代教育过渡。在此过程中，私塾和塾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从塾师的近代命运去透视中国

传统教育的转型和新教育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十分自然和恰当的视角,同时又可据以考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由此似乎又可以说,不了解塾师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又难以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教育的转型、中国新教育建立的艰难历程。

据上所述,蒋纯焦这一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十分清楚了。

既然称为塾师,可见这一社会阶层是以私塾的存在为前提,塾师的消亡自然就以私塾的消亡为前提,而私塾的消亡又与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解体和新式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的逐步普及相始终。循着这一线索,作者展示了塾师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消亡轨迹,描述出其阶层变迁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即:科举制度的改革终至废除,既切断了塾师阶层的仕进之路,降低了其职业吸引力,也破坏了塾师的产生机制,中断了新塾师的补充过程;新式学校的建立和普及,不断挤压着塾师阶层的职业活动空间,既压缩着塾师的职业队伍,也改变着其职业行为;近代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逐步形成,使得塾师社会角色的扮演、作用的发挥不再游刃有余,而是处处陷入困境,成为新时代的“不适当者”。表面上看,塾师阶层的最终消失是因了人民政府取消私塾、大办公立学校的一纸文告,实质上则是中国传统教育形式的终结和中国教育体制现代转型的完成,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阵痛,中国教育机构和教师职业实现了新陈代谢。

相比较林林总总的以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本项研究的特点在于不从正面去展现新教育和现代学校是如何建立的,而是从传统教育遭受挑战、陷入困境、部分地消亡进而实现转型,去展现中国新教育的建立过程。尤其是选择塾师这一生活、执业在民间的社会阶层作为研究切入点,就使教育历史画卷的展开回到了社会底层的教育现场,不仅使人更具体而微地观察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在基底层面的教育中所发生的生动过程,也使得这种观察所得更具有典型性

和象征性。

“塾师”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称谓，它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背影。蒋纯焦的这项研究又让这个影像变得清晰起来。研究塾师当然不是为了怀恋，也不是往他们落满了讥讽的身上再啐上几口，而是去试图理解他们曾经的存在意义以及不得不消失的缘由。

杜成宪

2007年4月

内容提要

塾师是传统社会中基础教育的组织者，是一个紧紧依附于民间社会的职业阶层。在传承社会文明、普及基础知识和维系传统价值观念等其他方面，塾师阶层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本书以观照晚清以降之塾师的变迁为视角，将这个阶层随中国社会发生转型而经历的历史过程，区为三个各有特征的阶段：其一，晚清新政的推行，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塾师们的仕进之路，降低了其职业吸引力；其二，民国时代新式学校的建立和普及，极大地压缩了塾师阶层的职业队伍，改变了其职业行为；其三，新中国创立后，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消解了塾师的社会空间，使之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全书取材宏富，文笔流畅，研究方法上亦多独到之处，可供多种专史和通史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蒋纯焦，生于1970年10月，湖南衡阳人，教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体育史，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变迁的实证研究，与人合著《民办咋办？——中国民办教育忧思录》（2001），参与编撰《城市中小学校课程开发的实践与课题：中日比较》（2005）、《体育史》（2005）、《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2004）、《中外教育简史》（2002）、《二十世纪教育学名家名著》（2002）、《华东师范大学校史》（2001）、《中国教育史》（2000）等。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师、中国基础教育与改革研究所985项目组成员、《中华大典·教育体育典·教育制度分典》课题组成员。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清闲客”与“自在囚”——前近代社会的塾师	14
一、“塾”与“塾师”	14
二、塾师的从业与执教	27
三、塾师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	47
四、个案分析	55
第二章 因袭与变更——19世纪下半叶的塾师	69
一、塾师职业需求与职业队伍	70
二、塾师教学活动与职业形象	89
三、塾师职业收入与社会流动	107
四、个案分析	119
第三章 教育转型与角色转换——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的塾师	137
一、废科举兴学堂的冲击及其局限	137
二、塾师与清末私塾改良	161

三、塾师认同危机与流动变化	175
四、个案分析	194
第四章 从主流到边缘的转化——中华民国时期的塾师	214
一、塾师与民国私塾改良	214
二、小学发展与私塾异动	237
三、塾师阶层的困窘与末路	257
四、个案分析	271
第五章 终结于新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的塾师	283
一、私塾消亡与塾师消失	283
二、塾师阶层消失的多视角分析	291
三、后塾师时代的乡村教师	295
四、个案分析	299
结语	304
附录一：蒲松龄作品三种	319
附录二：张先生讨学钱	342
附录三：《历代教育名人志》所收录的晚清以来塾师群像	360
参考文献	371
后记	385

导 论

一、研究缘起：从“倒放电影”到眼光向下

近现代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教育，都是在双重压力下寻找出路。这种寻找充满了焦灼与艰辛，有时夹杂着迷惘和困惑。经过一个世纪的寻寻觅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大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小到庶民的日常生活，都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变迁。研究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探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一样，充满魅力与诱惑，向来为学人们所关注和热衷。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史料的选辑为基础，探讨近现代中国教育变迁的论文、专著、丛书如雨后春笋，至今方兴未艾。如果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粗略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弥漫着一种严重的历史目的论气氛，即以“后来”的眼光看“过去”，从当下出发，“倒放电影”。^[1]具

[1] “倒放电影”的提出者罗志田说：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 19 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转下页）

体而言，在研究人物和事件时，往往着眼于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再行追溯，寻找原因；而不是“历史地”从原初出发，再审慎地沿历史进程缓慢推进。^[1]

以本书所要论述的主题为例：在研究清末至民国的中国教育史时，学界多致力于新式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最基础的承担者——私塾先生以及私塾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变迁几乎处于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淡忘状态。在多数教育史教材和通史类著作中，在晚清以前均会以一定篇幅探讨私塾先生和私塾教育，但行文至晚清，笔锋骤变，紧跟学制、学堂和后来被证明的教育家，对私塾先生和私塾教育多一笔带过，泛泛而论。^[2]其趋新弃旧之速，远甚于历史本身。而在一些专题性的著作中，对之亦着墨甚少。^[3]然而，在新式学堂建立后很长一段时

(接上页)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特定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但这一手法也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 [1] 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研究了庄存与、刘逢禄两人的历史档案、家谱、手稿后说：“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源自20世纪学者的共识。”参见[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代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 聊举三例：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有3页幅论及传统的私塾教育。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亦有3页幅论及清末私塾，名曰“私塾步履维艰”。于述胜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同样也以3页幅论及边区政府对私塾的改造。
- [3] 以同样是研究地方教育近代化的两本专著为例，《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张彬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在“初等教育的改善”中研究了私塾改良，占用6页幅；《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董宝良、熊贤君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则没有设专门的篇幅研究该省私塾。

间,私塾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的许多教育统计也表明,私塾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普遍存在。^[1]而且,从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系统的发生来讲,走的“下延型”路线,^[2]先高等教育,后初等教育。这就为私塾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间。

为了更好地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教育生活,本书试图舍弃“倒放电影”路线,眼光向下,回到社会底层的教育现场,以“私塾先生”这样一个职业阶层的变迁为视角,来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教育转型在底层教育中所引起的动荡、变化。用一位异域学者的话说,即剔除“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目的论,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加以研究。^[3]通过仔细的梳理和多向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塾师阶层的变迁在近现代中国教育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从其遭受新教育的冲击,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正好非常具体、直观地反映了传统教育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节节退缩,直至最终为现代教育所替代的历史过程。

二、研究综述

尽管学界有关中国近现代私塾先生及私塾教育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毕竟已经有人做了一些零星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打下了基础。鉴于本论题目前未有相关专著出版,我们从史料整理和研究论文两方面来展开综述。

[1]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 1935 年统计,当时江苏共有 24 259 所私塾,塾师 24 299 人,学生 436 647 人。在农村,私塾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学校(请注意,这一提法与塾生数量超过学生是有差异的)。1949 年,江苏全境解放,城乡各地仍存在大量私塾。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教育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3 页。作为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尚且如此,其他省份自不待言。

[2] 陈桂生:《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 页。

[3]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序论”。

(一) 史料整理。近现代教育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进行。1928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1961 年 10 月,为了应高校教学和研究的急需,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此书进行了整理再版,作为高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书,其中第二章第三节“传统的儿童教育组织及其改良”,收录一些清末私塾、私塾改良及民国教育部整理私塾的文献。

80 年代以后,相关史料出版渐多。1987 年 6 月,朱有璇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乙篇有“改良私塾”条目,收录清末文献 11 篇。1990 年 6 月,朱有璇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乙篇有“改良私塾”条目,收录民国文献 4 篇。1990 年 6 月,璩鑫圭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私塾部分占的篇幅较大,共有 100 页,其中还设有“塾师的生活待遇”专题。1994 年 5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教育(一)》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内有“改良私塾”条目,收录了 30 年代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文献数篇。1994 年 6 月,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上下两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宋元明三朝和清前期的私塾和塾师给予相当大的关注。1994 年 6 月,王鸿宾、武修敬等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收录近现代有塾师经历的教育名人近 50 位。1995 年 10 月,李桂林、戚名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上篇第二章内有“改良私塾”,收录清末文献 7 篇。美中不足的是,教育史学界对现代部分的史料似乎少有整理出版,尽管人们对“近代”的理解在时间上存在分歧,但近代教育史料一般终止于 20 年代,极少延伸到 30 年代。

(二) 研究论文。笔者对 1981 年以来的报刊索引进行了系统检索,

发现与本书相关的论文多集中于私塾及其在近现代的变迁,而直接以塾师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对于近现代私塾,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一些散篇论述,到 90 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研究论文逐渐增多。而对于塾师的研究,则在 90 年代后期才逐渐出现,到本世纪初略有增加。现摘要简述如下:

1. 有关私塾的论文,多集中于三个方面:

(1) 私塾教育及其评价。李国钧《明清蒙学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1992 年第 1 期),从识字、习字、阅读、作文等方面着重研究了蒙学中的语文教学,认为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有一定的人民性,训蒙的许多教材和教法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熊贤君《私塾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课程·教材·教法》1999 年第 9 期),对私塾的道德教育、书法教育、作文教学等进行探讨,认为私塾在教学方法上有一些值得借鉴学习之处,对于实施素质教育、丰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具有一定价值。熊贤君《如何正确评价私塾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2000 年第 1 期),就私塾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私塾的教学方法和学科教学经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认为私塾对促进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2) 私塾改良。熊贤君《中华民国时期私塾的现代化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1998 年第 3 期),认为中华民国对私塾的改造,取得了颇为成功的经验,在私塾塾师、私塾教学内容、私塾教学方法等方面,摸索到了一些行之有效、可供借鉴的管理办法。张彬、秦玉清《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年第 3 期),分三个阶段详细论述了浙江省对私塾的集中改良,并将改良进程与义务教育的推进联系起来。罗玉明、汤水清《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对私塾的改造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叙述了南京政府对私塾改造的基本措施,分析了改造私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田正平、杨云兰《中

国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年第 1 期),认为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特点;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3) 私塾与学堂二元并存。陈阳凤《论“废科兴学”以后私塾存在的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6 年第 6 期),认为私塾在清末民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统治阶级未能从根本上改革教育,是中国固有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学塾本身办理得当,办学形式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唐秀平《论民国时期江苏私塾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0 期),通过对民国时期江苏私塾状况进行剖析,从初等小学不发达、私塾改良、社会需求等方面,探索私塾尚能与学堂并存的缘由。贾国静《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 年第 1 期),认为清末民初,私塾仍占有相当比例,非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又存在互补与传承。郝锦花、王先明《论 20 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年第 1 期),认为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1]

[1] 该文还对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目的论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往往被看成是以西方科学知识为主的新教育取代传统的旧教育的过程,一个新式学校建立、扩展的过程。于是,传统作为一种被动的、停滞的一方,束手待毙,整个现代化过程就可以被简化为现代性征服传统、大获全胜的历史。而历史上更有生气的一面,即传统和地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抗、调适、接纳以及创新则被忽视了。”

2. 有关塾师的论文,多集中于两个方面:

(1) 塾师的社会生活。潘先军《塾师文化与现代作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5 年第 3 期),认为塾师文化对现代作家的作文模式、文化品格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乃至现代文学的民族化特色都产生过影响。韩凝春《明清塾师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认为塾师是以落第文人为骨干的乡间职业教育阶层;作为基层文人,他们有忠于朝堂、关怀教化的历史追求;塾师的收入与劳动付出基本不成比例;塾师通过文化的世袭、师徒、姻眷、乡亲、宗党等关系,构成其特有的社交关系网。刘云杉《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 3 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通过对清末塾师刘大鹏的研究,彰显科举废除前后塾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并以此透析士绅与国家的关系。徐梓《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第 4 期),认为塾师多是由科场失意而走上职业岗位,他们忍受着塾馆的冷清与孤寂、东家粗劣的饮食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倚人门墙的尴尬使塾师深感不自由;而束修支付的滞后,给塾师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2) 塾师的经济生活。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教育与经济》2000 年第 3 期),重在探讨民国中期湖北的塾师收入,认为塾师的经济待遇包括束修、膳食和节敬;私塾的级别、类别和塾师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塾师待遇的三个主要因素;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塾师既非薪俸很高,亦非啼饥号寒。郝锦花《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8 期),认为由于受废科举兴学堂的影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经济地位较 19 世纪有所下降,年收入大约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的 1/10,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但略高于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农民的 2.5—12.5 倍。另外,张